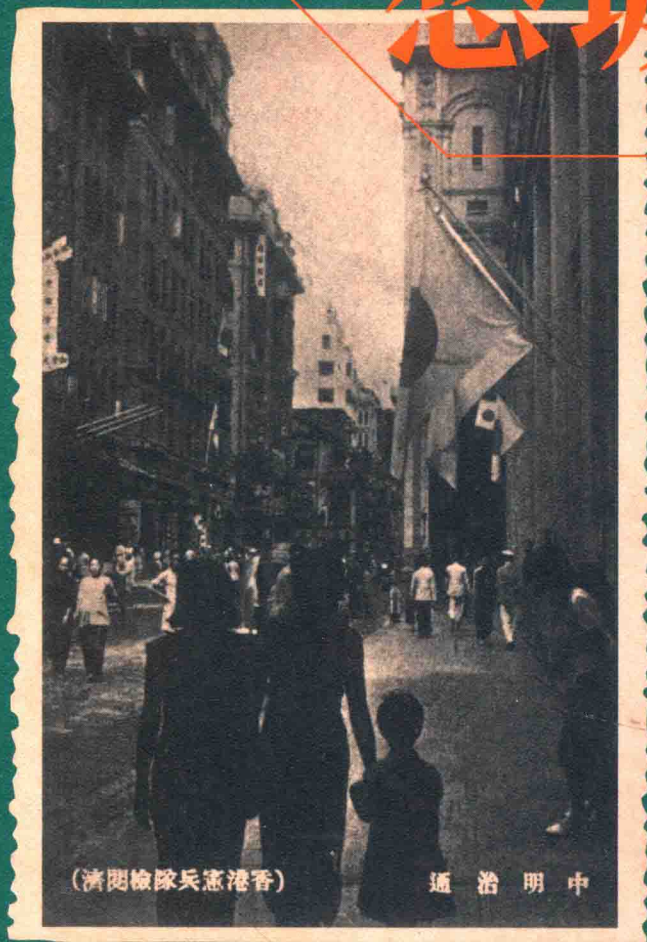


坐困 愁城

日佔香港的
大眾生活



(濟閱檢隊兵憲港香)

通治明中

周家建
張順光
著



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

周家建 張順光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梁偉基
書籍設計 吳冠曼

書 名 坐困愁城：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
著 者 周家建 張順光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14 字樓

版 次 2015 年 7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 16 開 (210 mm × 255 mm) 18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775-5

© 2015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 錄

序一（丁新豹） 001

序二（高添強） 003

序三（劉國偉） 004

序章 005

01

艱苦經營的經濟活動 009

02

供應緊絀的糧食物資 035

03

嚴密監控的社區生活 055

04

窒礙難行的交通運輸 085

05

諸多限制的郵政服務 107

06

宣揚和魂的殖民教育 133

07

聊勝於無的消遣娛樂 149

終章 171

鳴謝 172

序 一

日佔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百多年殖民地歷史的一個黑暗的片斷，也是香港史研究中一個較薄弱的環節。一直以來，有關這段歷史的研究及出版物多偏重於日軍侵港的十八天戰役及集中營的生活，資料來自軍事記錄及日記等原始檔案及老兵的訪談，以英文著述為多；回歸以來，東江縱隊香港獨立大隊在淪陷期間的抗日事蹟亦廣受關注，出版了不少專書，資料主要來自當年老戰士的憶述。但在「三年零八個月」時期港人的生活怎樣？日本如何管治香港？日治與英治有何分別？日治對戰後英國的管治方針可有影響？這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可惜的是，這方面的著述，屈指可數，而且大都是多年前的舊作，殊為可惜。

我們早在十多年前籌劃「香港故事」常設展的「日佔時期展廳」時已面對過資料不足的問題。一方面是檔案資料匱乏。據知在香港檔案處現存檔案中，戰時記錄只佔所藏的千分之五，日軍留存下來的唯一文獻是土地記錄，至於能反映該段期間日治政府的政治、社會、經濟情況，及港人苦難生活的官方記錄絕無僅有。文獻不足，只能以口述歷史作補足。在一九四一年冬，由於周邊地區相繼淪陷，內地同胞蜂湧來港避難，本港人口驟增至一百六十萬，達至戰前高峰，但在日佔時期，日治政府以人口太多，難以應付，乃有計劃的把港人遣返原籍，及至日本投降前夕，人口已減至六十萬。不少港人都在一九四二及一九四三這兩年離港他往，故能憶述該段時期香港社會民生的人相對不多；而其時留港的人，尤其是頭面人物中，或有與日本人有不同程度合作者，有鑑於被指為漢奸的顧忌，他個人（及後代）都對「三年零八個月」的管治和生活經歷或避而不談，或語焉不詳。真確的口述歷史資料不易取得。

是書卻另闢蹊徑，透過超過一百件民間留傳下來的日佔時期舊物，包括：租單、電費單、水費單、土地稅單、房產稅單、保險庫收據、銀行股息單、電車票、巴士票、輪船

票、馬票、馬牌、明信片、老照片、通用郵票、報刊廣告等，涵蓋經濟活動、糧食物資、社區生活、交通運輸、郵政服務、教育事業、消遣娛樂七個範疇，配以精簡的文字解說，以重構「三年零八個月」普羅市民的生活面貌，從一個嶄新的角度認識這段歷史。兩位作者，周家建對日佔時期素有研究，張順光是知名收藏家，兩位專家的合作為我們提供了一本既有大量資訊，又趣味盎然的日佔歷史讀物。今年為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有興趣多認識這段歷史的讀者，不容錯過。

丁新豹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

序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年，到了今天，這段悲慘歲月的親歷者大都撒手人寰，餘者寥寥，「三年零八個月」的痛苦記憶亦漸被淡忘，成為抽象的歷史名詞，甚至是遙遠的傳說。對生活於和平時期的人來說，他們大概沒法想像數以萬計的市民和難民在這裡因戰事、飢餓又或日軍的殺戮而無辜喪失生命。

本書的兩位作者以文字表述，以及難得一見的文物和照片，記錄了這段黑暗的日子。每件物事都是會說話的明證，告訴我們歷史的教訓，只要它們被保留、被展示，都會不停的「說」下去，警示世人香港經歷了一段口和筆難以道盡的塗炭之苦。

高添強

香港史及歷史照片研究專家

序 三

很榮幸能為兩位好朋友的新書寫序。張順光先生 (Alan) 熱愛收藏人盡皆知，他同時亦不吝惜跟他人分享其收藏，讓公眾能從舊物中鑑古知今，在下十分欣賞。周家建博士博學多才，過去參與多項有關香港歷史研究工作，在下每有求教，周博士亦不厭其煩一一解答。

研究香港歷史的書籍近年來可謂百花齊放，可惜關於日佔時期的卻不是太多，本書正好讓讀者輕鬆瞭解日佔時期港人的生活，今年正值香港重光七十年，可謂意義重大。兩位作者巧妙利用不同類型的資料，如歷史檔案、舊報紙、口述歷史、老照片等重現日佔時期生活情況，其中令人驚喜的，莫過於大家使用完十之八九必會棄掉的東西，居然會在本書發光！這些東西就是車票、租單、水費單及電費單等日常生活憑據，兩位作者將這些東西（如今當然是珍貴的藏品）反覆推敲研究，驗證官方文件中日方對香港的政策。大家不妨細心留意日常報紙的廣告、車票、單據，再看看書中的研究方法，可能有意外驚喜！

本書亦是一個很好的示範，教導大家如何利用檔案等原始史料去編寫不同時期的生活面，對有志研究香港史或需要撰寫研習報告的讀者們，本書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材。衷心期望兩位可以繼續在不同課題上合作，將香港歷史的抽屜一一打開，將是讀者之福。

劉國偉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執行總監

序 章

柯林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在《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中曾指出，歷史是一門「研究人類在過去所做的各種行為的科學」。而柯氏認為歷史研究應從詮釋史料去開始，因為史料是記載著「時與事」之物。¹作為「時與事」的載體檔案就成為了歷史研究倚重的東西，因為它可以印證出事件發生的始末與過程。

檔案（records）通常被視為史料的一種，歷史研究者以搜集歷史資料為起點，從而進行嚴謹分析來將事件的前因後果作客觀判斷、鑑定與解釋。由於歷史檔案的時空因果關係最清晰，因此歷史檔案是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有助將事件的真相呈現出來。

檔案的普遍定義是：「意指任何組織或個人在執行公務期間，以任何形式或媒體編製、接收或蒐集的紀錄資料，這些資料可作為處理公務及進行活動的憑證，並保存下來作參考及其他公務用途。」²

檔案的產生經歷多個步驟，早期的「常用檔案」（current records），是因公務而產生。公務檔案係指因公務活動而產生的檔案，其形成的主體主要是公務機關或其他社會組織。公務檔案包括法規、財政及行政公文等文書記錄。當公務完結後，那些很少用或參考之用的「常用檔案」會轉變成「非常用檔案」（non-current records）。當「非常用檔案」經鑑定的程序後，一些具歷史價值的將會被永久保存下來。因應其歷史價值而被永久保存的檔案，稱之為「歷史檔案」（archival records）。

官方檔案的保存，大多收藏於檔案館。但是一些檔案因應公事上的需要會產生多個拷貝，例如官方保留著登記文件的正本，而市民保留著官方發出的文件副本等。

除公務檔案外，人們亦會因應其生活習慣和模式而產生「私人檔案」，例如日記、文稿、筆記、信函等。有別於公務檔案，私人檔案保存在缺乏檔案學的基礎概念下，並沒有因此而產生出完整的「檔案組別」（records series），但仍因其歷史價值而顯得意義非凡，彌

足珍貴。

站在學術研究角度而言，不論是官方檔案或私人檔案，兩者皆與社會發展有著密切的關連。從分析檔案內容，讓檔案內的原始資料，不單表述出檔案與現實的關係，更可重構歷史的真像。

如同早期的檔案一樣，日佔時期的檔案可分為立體檔案和平面檔案。現存於香港的日佔時期立體檔案並不多，當中包括拔萃男書院校史館藏有的、在校園內出土的日軍軍刀，香港海防博物館蒐藏的日軍制服，香港日本人學校小學部保存的香港國民學校神社的石獅子，筲箕灣譚公廟內的日佔時期碑文等等。平面檔案方面，現存於香港歷史檔案館的日佔歷史檔案，多為田土檔案和一些法庭材料，數量並不多。

香港民間收藏的日佔時期歷史檔案，則以紙品收藏為主，包括了書籍、報刊、圖冊、信札、照片、郵票、票證、單據、合同、契約等等。紙品作為歷史載體，多以文字或圖案來記載事件始末。每件紙品收藏，都能反映出那個時代的某個方面的發展，以及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徵和相關的人文精神。

既然檔案乃瞭解史實的基礎，因此進行歷史研究時，不能侷限於單一思維與視野，必須從多元化角度切入，才能作全方位表述。日佔時期，普遍的論說多以為市民生活貧無立錐，境況堪憐。但當談及「生活」時，狹義來說，是指人類生存的過程，包括工作和享樂。而廣義的表述，則是指人類日常所需的物質，例如衣、食、住、行的相關需求。³正因「生活」在每一天因人的活動而存在，因此與「生活」有關的檔案亦應運而生，例如「軍政廳民政部水道班」發出的水費單、「香港占領地總督」磯谷廉介簽發的「營業證明書」，以及「香港競馬會」的職員保證書等等。在環環相扣、循環不息的情況下，日佔時期的檔案成為了印證當時「日常生活」的載體。

在波譎雲詭的香港近代史長廊中，日佔時期的史料相對貧乏。本書祈望透過簡短的文章，輔以一些民間收藏的珍貴記錄，將「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市民的日常活動呈現於讀者眼前。

註釋

- 1 柯林烏著，陳明福譯：《歷史的理念》（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頁12。
- 2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歷史檔案及檔案管理政策》，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sec/lc_archives/lc_archives_policy.pdf（瀏覽日期：2015年3月20日）。
- 3 梅英：〈生活與藝術之我見〉，《台灣源流》，第26期（2004年3月），頁127。

01



艱苦經營的
經濟活動



日佔時期，物資供應不足，市面變得蕭條，營商環境並不理想，一般市民三餐不繼，更遑論有多餘的消費購物能力。

儘管形勢嚴峻，但當時的商業活動並非全面停頓下來，在商人的刻苦奮鬥下，部份工商業得以恢復運作之餘，亦衍生出一些新興的行業，成為淪陷時期，香港經濟活動的一個特色。

輕工業

戰前香港是華南地區的工業中心，劉蜀永教授在〈戰前工業的崛起〉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華人企業家開始在香港發展工業，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更將香港的工業推上另一個高峰。1939 年，香港的工業品出口總值達九千九百萬港元，當中以織造業、煙草業、膠鞋製造業最興旺。¹

然而，在日佔時期，物資供應短缺，社會秩序混亂，令本港工業受到重挫。更重大的打擊是，為了搶奪物資以支持其在太平洋的戰事，日軍攻佔香港後，一些工廠馬上被軍方查封，並且拆除機械設施及充公原材料。以成衣的製造和銷售為例子，其中三星織染廠分廠三三織造廠因曾在戰前為港英政府生產物資而被查封；中華電機織染布廠被日軍強行佔據，只有寥寥數家織造廠得以局部復業，如中光電機布廠、國光電機布廠等等。在生產量少和缺乏原材料的情況下，棉織品售價昂貴，甚至爛襪亦有其價值，當時有不少小販沿街收買爛襪，據說每對值二三十錢。²

錢福注憶述其家族經營的昌興和機器製罐廠被日軍搬走物資的情況時，說：

大約 1942 年年中至年底之間，日本人將我們工廠的白鐵管原料搬走。我們負責到工廠看著他們搬貨，記下日本人搬走原材料的時間和數量。我天天到工廠看著日軍搬走甚麼箱子，點算後大概有一萬件貨物。³

日治政府對原材料關注的原因是金屬在戰時被視為軍事物資，因此進出口都受到監管，並且必須得到「總督部」的認可，方能憑證購買所需原材料。⁴

後來，經「總督部」批核後，部份工廠得以復業。根據 1947 年出版的《香港工廠調查》，淪陷期間復業的工廠包括：香島製漆公司（漆、油類）；中光電機布廠、國光電機布廠、港粵金山織造廠（織造類）；麥明記機製牙刷廠、鄧忍記機製牙刷廠、利華製帽廠（日用品類）；依依樹膠廠、中英橡膠製品廠（橡膠類）；同茂皮廠、夏雲楨箱皮具公司（皮革類）；海棠化妝品廠（藥品、化妝類）；倫敦糖果公司、淘化大同罐頭醬油公司、興亞果子有限公司（食品、調味類）。⁵

百貨業

日佔期間，香港的百貨業仍然運作如常，為市民提供選購上等消費品的服務。當時仍有營業的百貨公司，包括瑞興百貨公司、永安公司、中華百貨公司、先施公司和大新公司。⁶日資百貨公司亦相繼在香港開業，當中包括松坂屋、玉屋等等。而主要售賣服飾和布匹的專門店，如老介福綢緞莊、美美兒童服裝和榮芳洋服等，均繼續營業，並且在報章上大賣廣告。⁷

百貨公司亦成為展覽場所，例如「總督部報導部」從 1942 年 12 月上旬起假座東明治通松坂屋百貨公司二樓，⁸舉辦「大東亞戰爭一週年紀念寫真展覽會」，同月下旬，再在玉屋百貨商店二樓舉辦「戰時下日本寫真展覽會」。⁹可見在日佔時期，百貨公司除了是市民大眾消費的場所外，亦成為日治政府進行政治宣傳的場所。

故衣業

淪陷時期，本港產生了一些新興的行業，故衣業是其中的佼佼者。故衣業的興起，一方面是因為成衣製造業的萎縮造就了故衣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經濟的丕變以及環境的變化。當時，本港經濟受到戰爭影響而變得蕭條，市民消費能力轉趨疲弱，同時令物資供應環境產生變化，衣料來源變得缺乏。在兩者互相影響下，遂衍生了買賣故衣這個行業。

故衣業可以分為故衣攤、故衣檔和故衣店幾種。故衣攤主要是物主將家中衣服擺地攤變賣，以賺取生活費。故衣檔則屬小本經營，用最低廉的價錢買入故衣，再轉售給故衣店賺取微利。故衣店就如同一家服裝店，不僅資本較為充裕，售賣的貨品亦較為上乘。日佔初期的香港故衣市場，主要集中在灣仔及港島東區。後來因為港島東區屢受盟軍空襲，故衣市場遂轉移到荷李活道、西明治通高陞戲院一帶，¹⁰ 當中以荷李活道的故衣店出售的貨品最為上乘。九龍方面則集中在上海街、長沙灣和油蔴地一帶。

即使故衣的價格比新的衣裳便宜，但部份的價格亦不菲，例如冬天大衣便要四十元一件。¹¹ 1943年3月23日《香島日報》內〈故衣〉一文，就寫出市民選擇故衣的原因：

在生活程度日高，物價高昂的今日，到足頭店或百貨公司選購衣料的，當然會有一部份人，可是一般的市民來說，他們大多數是購買力薄弱，一碼之布動輒三四元至六七元，一身衣服起碼也非二三十元不可。月中所入有限，他們怎能負擔得起這麼大的開支。但是衣服不能不穿。於是祇有改變途徑於故衣店裡去。¹²

當時在街上出售故衣的主要是普羅大眾，他們把家裡值錢的衣物拿到街上擺賣來賺取生活費。除本地顧客外，鄰近地區如廣州和廣州灣等地商人紛紛來港搶購故衣，特別是來往粵港兩地的水客就成為了故衣的主要顧客，這些水客從農村帶來糧食出售，再選購故衣帶回家鄉出售，以此賺取微薄利潤。¹³

至於一些資本較充足的故衣商看準了中國內地龐大市場的需求，紛紛前往香港搜購故衣，然後帶往廣州灣、澳門、廣州等地出售，甚至遠銷至雲南、廣西等地。據行內估算，1942年下旬，大商號的營業額達數十萬元，小商號的亦逾十萬元。¹⁴ 足見當時故衣業的興旺環境，為本港及內地商人尋找商機的途徑。然而，到了1943年上旬，故衣的銷情開始轉淡。¹⁵

值得一提的是，故衣店與當舖店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故衣店中不少貨物都是來自於當舖店。當舖店將客人逾期不贖的衣物轉讓給故衣店。